

為中國人成為中國人的福若瑟神父

張希賢

「對猶太人，我就成為猶太人，為贏得猶太人；對於在法律下的人，我雖不在法律下，仍成為在法律下的人，為贏得那在法律下的人；對那些法律以外的人，我就成為法律以外的人，為贏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其實，我並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對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贏得那軟弱的人；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人。」(格前 9:20-22)

為聖言會首批到中國傳教的傳教士福若瑟神父(St. Joseph Freinademetz)來說，聖保祿宗徒這番說話正好是他在中國傳教生活的寫照。福若瑟神父在 1882 年到達中國山東濟南展開傳教工作，直至 1908 年逝世，終其一生熱心服務他的傳教區。他熱愛中國人，熱愛中國文化，為了贏得他們，他的生活行為完全變成中國人。他對天主教會在中國特別是山東濟南一帶的傳教工作作出不少貢獻，被譽為「魯南傳教區的母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2002 年更宣告他為聖人，是中國第一個精修聖人。

到中國傳教的召喚

福若瑟神父於 1852 年出生於意大利的提洛省(Tyrol)¹，在一個度

1 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提洛是奧地利的屬土，因此福若瑟神父也被視為奧國人。

誠的天主教家庭中長大。他的家鄉位處高山上，土地貧瘠，但人民都敦厚誠樸，生活簡單，形成他純樸、耐勞、矢志愛主的性格。

福若瑟神父二十三歲晉鐸，被派到聖瑪爾定鎮大堂任副本堂。雖然他在瑪爾定的工作很出色，備受當地教友愛戴，但他一直的志願卻是到中國傳教。當他做修生時，曾聽到講道者引用耶肋米亞的哀歌論及中國：孩子們哭著要餅，但沒有人給他們。他深受這句話所打動，而到中國傳教的聖召，就在這段時期進入了福若瑟神父的心靈。

於是在晉鐸後兩年，即在 1878 年，他加入了由楊生神父（Arnold Janssen）創辦的傳教修會聖言會，並在 1879 年獲楊生神父派遣，與安治泰神父（John Baptist Anzer）一同前往中國傳教。

由於當時聖言會尚沒有自己的傳教區，他們首先抵達香港，在西貢鹽田仔和大嶼山服務，學習中國的風俗、習慣、語言，並學習如何拓荒傳教，以便為日後正式到中國傳教作好準備。

後來，原本負責山東傳教區的方濟會，因傳教區很大而會士不多，有意把部分地區交托其他修會。聖言會會長楊生神父與方濟各會長經商討後同意，並徵得羅馬教廷准許，方濟各會於是把山東南部，即當時的兗州、沂州、曹州及濟寧劃歸聖言會的傳教地區，成為魯南教區，計有三十餘縣。

1882 年一月二日，安治泰神父正式成為魯南教區的領袖，以陽穀縣的坡里莊為中心，幾星期後福若瑟神父也由香港來到，踏上了這塊人口接近一千萬，但教友人數只有一百五十八位的新田。

艱辛的傳教歲月

在中國傳教並不容易，天主教經孟高維諾、利瑪竇、湯若望等傳教士傳入中國，但基於種種原因，播下來的信仰種子並未能毫無阻礙地茁壯成長，廣傳並扎根於中國土壤。福若瑟神父在魯南傳教區也面對不少困難。

1. 文化衝突

山東是中國至聖先師孔子出生和興學的地方，儒家思想影響深遠，加上中國人對自己數千年的傳統禮儀文化甚感自豪，認為是最中心和重要的國家，外國人則為沒有文化的「洋鬼子」，只恃著船堅炮利侵略我國，因此要接受基督宗教這類洋教殊不輕易。

另一方面，外國傳教士對中國文化並不認識，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以為中國的禮儀習俗都是迷信，敬拜邪神；又抱著高人一等的心態來「解救」中國人民。與福若瑟神父一同到山東並成為魯南傳教區長上的安治泰神父曾說過：「我的唯一目標，也是我一生的奮鬥和艱難的目的，就是在孔子的出生地曲阜高舉基督的標準。」²又認為這「迷信之地」一旦倒下，基督宗教將在各地凱旋勝利。這種完全以對抗和必勝的心態，根本無法贏取中國人的心，反而導致反基督徒的暴亂和迫害。

2 柯毅霖，陳愛潔譯，「福若瑟與安治泰：兩位傳教士，兩種風格」，《鼎》第二十三卷總第一百三十一期（2003年冬季號）。

2. 政治因素

福若瑟神父到山東傳教期間時值十九世紀歐洲列國民族主義、殖民主義興起的時代，以武力擴張勢力，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以取得商貿利益，而中法戰爭、德國佔領青島等事件，更令中國人對侵略祖國的外國人充滿恨意。由於傳教士是外國人，受法國和德國保護，被視為與侵略者一夥。因此有些狂熱分子會阻撓興建聖堂，或進行破壞，甚至迫害教友、殺害傳教士。1897年就有兩名聖言會會士遭仇恨外國人和傳教士的人殺死。情況最惡劣時是 1900 年大刀會（即義和團）的出現，大刀會以扶清滅洋為口號，排斥和殺害外國人，傳教士的生命因而受到威脅。福若瑟神父也一度應政府命令要逃到沿海一帶的安全區去，卻中途因不捨得撇下他的中國教友不管而毅然回到了他的傳教站坡里莊，即使有捨身致命的危險也在所不辭。

3. 語言隔閡

到中國傳教必須學習中文和認識中國文化傳統，不識中文或說得不好、一知半解會造成溝通上的障礙，影響傳教工作。但中文並非容易掌握的語言，加上方言到處不同，福若瑟神父在香港學到的方言，到山東便絲毫用不上，得重新學習。幸而福若瑟神父很有語言天份，自小在學習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都有很好成績。經過多月的努力，福神父很快便學會了山東話，有人甚至說如果不看他的面，只聽他說話，會以為他是道地的山東人³。因此，福若瑟神父很注重培育傳

3 周華德，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天主教聖言會，1996，台北，第 67 頁。

教士中文，有新傳教士到來，他必先安排他們學中國話，待他們有了好的語言基礎和認識中國文化後，才分派他們工作。

天主教的官方語文是拉丁文，經文、祈禱文和要理問答都用外文寫成，必須翻譯成中文，但以往的譯文都用較深和古雅的文字寫成，為不少中國人造成困擾，特別是那些不識字的人，要背誦從陌生的語言生硬地翻譯過來的經文、祈禱文和要理問答委實不易。為此，福若瑟神父要花許多時間和心機撰寫中文祈禱書籍，或重新翻譯經文，並由中文專家修正，務使譯文合乎文法、流暢易讀，讓中國教友明白使用。

4. 經濟問題

到外地傳教的傳教士往往遇到財政困難，福若瑟神父也不例外。魯南地區並不富庶，為修建聖堂、辦學校和孤兒院、培育傳道員、本地神職和傳教士，都要花費大量金錢，經常從總會一收到錢便用光。福若瑟神父為此多次向聖言會會長楊生神父要錢，但總會財政也有困難，無法給予足夠資助。加上傳道員以為傳教士有錢，收了太多望教者，而這些望教者只為教會給他們的食物，發現沒有便走⁴。福若瑟神父只好向方濟會士借貸，或向法德兩國領事求助，也曾寫信向家鄉的友人借錢，解決傳教區的財政困難。

另一方面，居住在這貧窮地區的中國人，即使有意成為望教者或教友也不容易，因為生活艱難，如為守贍禮或慶日而不工作便沒有收

4 Fritz Bornemann, *As Wine Poured Out: Blessed Joseph Freinademetz SVD, Missionary in China 1879-1908*, Rom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1984, 86.

入，生活頓成問題。因此，福若瑟神父曾請求把慶日由平日移往下一個星期日，並恩准他們在星期日下午工作，更放寬規定，毋須每天參與早禱，或可在家誦禱，不致影響他們的工作和生計。

5. 其他困難

此外，福若瑟神父在山東傳教還遇到其他困難，例如傳教區地方廣大，人口分散，望教者和教友在不同村落居住，道路崎嶇難走，神父探訪他們須花很多時間；加上政局不穩引致治安問題，土匪到處橫行，出門不安全，被劫財物外更有性命危險；而且不少人有反對外國人的成見，也有人捏造事實，說傳教士殺害嬰兒等可怕罪行；當時中國人還有吸鴉片的問題，但按照教會規矩，須先戒煙才可入教，令部分有意入教但有煙癮者卻步；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觀念下，由於缺乏女性傳道員，未能向婦女傳教，影響整個家庭信教，以致爲了能向婦女傳道，福若瑟神父得委派泰和莊一個只有十歲的女孩擔負教導婦女的工作。

與安治泰神父的關係

在魯南傳教區工作期間，另一個不斷困擾福若瑟神父的問題竟是他與長上安治泰神父的關係。

福若瑟神父與安治泰神父都是聖言會最早期的學生，也是首兩位獲派遣到山東建立首個聖言會傳教區的傳教士。他們本是朋友，又是同伴。安治泰神父是傳教區長上，福若瑟神父則爲第二號人物。每次安治泰神父要暫時離開，返回歐洲或到別處工作，都由福若瑟神父代爲管理，出任傳教區主管。

然而，由於安治泰神父酗酒、性情暴燥，與會內其他弟兄不和，福若瑟神父曾多次應弟兄的請求嘗試規勸他，結果令兩人的關係緊張。安治泰神父非但拒絕接受福若瑟的勸誡，還以《法典》的制裁來威脅他。1894年九月廿八日，安治泰在一封措詞尖刻的信中，指責福若瑟神父的種種「過失」：是他的死敵，密謀推翻他，想他下台⁵。

其實，福若瑟神父從沒想過要與安治泰神父爭奪名位。最初方濟各會主教有意委派他為魯南傳教區長上，但他堅拒這項任命，並謙遜地指出安治泰神父在行政上比他好，但自己在對待同儕會友或指派他們時總難以下手，寧願做個行動傳教士。

即使安治泰神父行為不檢的報告已上達總會和羅馬，福若瑟神父也維護他，說他正努力糾正。只是安治泰神父屢勸不改，且變本加厲，才令福若瑟神父無意再為他辯護。結果在1903年，安治泰神父須到羅馬接受有關指控他的調查，但他在抵達羅馬不久即因心臟病而突然逝世。

福若瑟神父當時是省會長，本應理所當然成為安治泰神父的繼任人，而總會長和他的兄弟也提名他。但是德國公署卻以福若瑟神父是奧國人而非德國人，否決這項建議，選擇了韓寧鎬（Augustine Henninghaus）神父繼承安治泰出任宗座代牧，而福若瑟神父則留任省會長一職⁶。

5 柯毅霖，陳愛潔譯，「福若瑟與安治泰：兩位傳教士，兩種風格」，《鼎》第二十三卷總第一百三十一期（2003年冬季號）。

6 柯毅霖，陳愛潔譯，「福若瑟與安治泰：兩位傳教士，兩種風格」，《鼎》第二十三卷總第一百三十一期（2003年冬季號）。

無私奉獻

福若瑟神父自 1879 年離開家鄉提洛到中國傳教，一直再沒有返回提洛，在魯南傳教區二十七年間，在沒有任何交通工具的環境下，靠著一雙腿步行，無論炎天寒冬，晴天雨天，都不畏艱苦地上山下鄉，從一城到一城，從一村到一村，走遍面積七萬多平方公里，人口接近一千萬的魯南教區，探訪民眾，向他們講道、講要理，為教友做彌撒、聽告解、施行聖事，同他們一起祈禱。

福若瑟神父不怕艱辛，全心全意向山東人民傳揚基督福音，他興建多座聖堂，開辦孤兒院收留無家可歸的兒童，透過讀書班和學校教育兒童認識天主的道理。他對教理教授要求十分嚴謹，堅持望教者須接受詳細深入的教理（年半至兩年），反對倉卒領洗；又開設傳道員訓練班和修道院，培育當地神職，協建有自己本地神職的教會，首名中國主教田耕莘樞機便是出自魯南陽穀主教區。同時他也設法出版好幾本書：《天主教教理大全》、《講道集》、《問答釋義》、《天主教社團領袖手冊》、《彌撒經文》、《傳教員手冊》、《少女手冊》等⁷，對傳教區的培育和傳教工作作出不少貢獻。

福若瑟神父為傳教區不眠不休地工作，每晚都工作到深夜，但早晨三點即起床再去工作。為了他的教友，好多次他都置個人安危於不顧，而與那些強加在中國教友們身上的非正義的事情作堅決的鬥爭，找政府的官員為教友辯護。有一次，福若瑟神父要求一位官員釋放他

7 周華德，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第 103 頁。

的一個傳教員，但後來在一家旅店裡卻受到了一夥人的攻擊，他們搶奪了他所有的東西並差點把他打死⁸。

後來，流行性傷寒在魯南蔓延，雖然這病傳染性很高，福若瑟神父仍毫無畏懼去照顧病人，他就是在為病人聽告解、病傳時受傳染，並終於1908年一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五十六歲。他死前曾表示希望葬在中國墓地：「我沒有別的意願，只希望我的屍骨能埋在我中國同胞的中間。」⁹

熱愛中國

在福若瑟神父帶領下，傳教區由當初只有一百五十八位教友，擴展至二十萬人，並有慕道者四萬三千之多；神父也增至四十六位，其中還有十一位是中國籍神父。能取得這豐碩的成果，除了他靠著對主的信賴，無懼困難堅持傳揚主道外，他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對中國人的愛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正如他對傳教士的勸言：「愛是外教人所懂的唯一國語言！」¹⁰

其實，福若瑟神父最初來到中國時，也帶有當時歐洲人對中國人的偏見：以為中國人沒有高尚情操，不會接受傳教士真心出自真愛地幫助窮苦；又責備他們買賣兒童，只顧物質生活。不過，透過學習中國文化，以中國人的眼光看世界後，他改變了最初膚淺的看法，打從內心欣賞尊重這個文化，愛上中國來。

8 「聖福若瑟-天上的『中國人』(下)」，《公教報》，2003年11月9日。

9 周華德，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第156頁。

10 同上，第160頁。

他到達中國後，努力學習中文，穿著中國服飾，短白褲子、白襪、布鞋、長外衣，還留了中國人在當時所保有的鬍鬚與髮辮；飲食方面，他棄用刀叉而改用筷子進食，完全採用當時山東民間的飲食，而且吃得津津有味，甚至說：「中國北方的飲食和提羅爾山¹¹中的飲食十分相似。」¹²

他曾多次寫信給家人和朋友，指自己已逐漸成為中國人。他寫信給一位在家鄉聖理爾定堂的神父說：「我愛上了我的中國人民。我視中國，它的人民，和它的語言一如我家鄉的。如果天主喜歡，我願在這裏工作七十年，我願為他們再死一千次。我願同他們埋在一起。我是中國人多過提洛人。我願在天堂還是中國人。」¹³

他對中國教會、對山東教會有著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深厚感情，雖然他深愛自己的祖國，很懷念家人，想回去探望他們，但 1885 年聖言會打算在維也納興建新修道院，有意把他召回奧國，由他與奧國政府交涉並做修道院院長時，由於福若瑟神父最大的願望是在中國傳教，也捨不得離開他努力建立的傳教區，便懇求會長楊生神父不要把他召回歐洲，甚至表示把他召回對他是一種懲罰。

這是因為他認為到中國傳教是非凡的恩惠，一如他寫信給在修院讀書的侄子說的：「你修道要升神父的這件事很使我高興，如果有一天你也能來中國傳教，這對你來說也是一種非凡的恩惠。」¹⁴他又曾

11 即提洛山。

12 「真福福若瑟」，http://www.svdchina.org/josef_7.htm。

13 周華德，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第 126 頁。

14 同上，第 57 頁。

告訴同會弟兄：「如果我能再年輕一次，我仍會選擇我的聖召，我仍會毫不遲疑地做同樣的選擇：山東南部的傳教士。」¹⁵

在真正認識中國文化後，他看到中國文化的優秀之處，因而十分尊重，他甚至認為「中國人實際上站在諸民族的頂端。他們所缺少的是基督的信仰。」¹⁶一次他向新從歐洲來的會士讚揚中國人說：「中國人有優良的性格，嚴肅的風俗，家庭生活中高尚的貞潔」¹⁷。同時提出歐洲近代的生活，兩相比較：「為我們及中國人最大的禍災是一群無道德，無信仰的歐洲人，他們雲集中國各地。他們唯一的興趣是金錢和享樂。他們的道德標準是零。無疑地我們不信教的中國人比這些人渣要好百倍。」¹⁸使得這位新來的傳教士很不服氣。

因此，教友都愛戴福若瑟神父，認為他是活聖人，「他像孔夫子，常友善、端莊、謙遜，一切美德全集於一身。我們都尊敬他，對他評價最高。論安治泰神父，我們都怕。但我們一致的，沒有例外，都愛和稱讚福若瑟神父。」¹⁹

結語

福若瑟神父完全具備真正傳教士的精神，並身體力行予以實踐。

15 周華德，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第 156 頁。

16 普路茲、米格，薛保綸譯，《真福福若瑟神父傳》，天主教聖言會，1996，台北，第 45 頁。

17 「真福福若瑟」，http://www.svdchina.org/josef_7.htm。

18 周華德，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第 127 頁。

19 同上，第 123 頁。

他明白到傳教士的目的是把基督的信仰帶給未認識主的地方的弟兄姊妹。這些人雖然與自己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但都是天主創造的子女，大家都是平等互愛的，無分彼此，正如保祿宗徒所說的：「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迦 3:28)

爲了讓基督信仰得以在當地扎根成長，本地化的工作十分重要。事實上，基督是普世的救主，超越世俗一切，爲所有人、所有文化都適合，基督信仰並沒有鄙視排斥別國的傳統習俗，反而懂得珍惜這些習俗。因此，他向傳教士勸言：「千萬不要打擾人家的傳統習俗，只要並非迷信，應盡量適應這些習俗，贏取人家的尊重，如強要輸入法、德、意國習俗到中國，是最愚蠢的行爲。」²⁰

福若瑟神父本著愛主愛人之心，以基督爲眾人之僕爲榜樣，到中國傳教。由於他所採取的傳教態度是：尊重、團結、持重、本地化、沒有政治議程和民族主義利益，他能進入中國人的世界，尊重和欣賞中國文化，一方面得以贏取中國人的信賴和信心，成功在魯南傳教區建立起基督的團體，同時也轉化了自己內心，真心愛上這個民族，並願意爲中國人成爲中國人。

20 Fritz Bornemann, *As Wine Poured Out: Blessed Joseph Freinademetz SVD, Missionary in China 1879-1908*, Rom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1984, 182.